

端午记

□ 郁葱

对端午最初印象，源于粽子。我生长在华北平原一个幽静的小镇，端午在我们那里也被称为“端阳节”“五月节”或者“五月端午”。每到初夏，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。粽子一般是三角粽或四角粽，有红豆沙馅、枣泥馅的，更多的是往里面放两颗红枣，粽叶就是比较宽的芦苇叶。先把糯米或者黄米泡上半天，再包起来用细绳捆紧，放到锅里用火煮。那时特别想吃的，就是粽子里面那两个很甜很甜的大枣。记得头一年买了新粽叶，吃完粽子以后粽叶是舍不得扔的，洗干净挂起来晾干，等到第二年再用。还记得妈妈用春玉米叶包过粽子，虽然跟粽子叶包的味道有很大区别，但吃起来依然是那么香甜。

后来，就知道了屈原，那是在我10岁左右读了他的《离骚》之后。我读的第一本有关屈原的书是郭沫若先生的《屈原赋今译》。图书馆的阿姨给我时书还很新，估计没有多少人借读过。实际上我当时是看不懂的，但觉得那样的作品很有气势，于是把喜欢的段落抄在了日记本上。我喜欢《离骚》，每每吟诵，都会让我感奋不已。

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倪老师，是一位文学爱好者。记得有一天下课后，我收了同学们的语文作业交到办公室，看到老师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《离骚》，就随口背出了其中的几句。倪老师很惊讶，问我：“你读过《离骚》？”我点了点头。那天倪老师话多了起来，看得出来他有些兴奋，他对我说：“中国的诗歌作品在屈原之前多为短诗，屈原开了浪漫主义长篇巨制之先河。《离骚》通篇有2400多字，是一种豪放的抒情。而《天问》中，问天地、日月、山川、灵异之外，所涉及的大多是楚国的人和事，这是他‘呵壁问天’的经典之作。”坦率地说，老师讲述这些的时候，我有些茫然，似懂非懂，但从老师的神情中感受到，写诗，一定要有“问天”之作。

我记得最早看到的香港影片就是《屈原》。那一天，石家庄八一礼堂座无虚席，电影的放映时间比较长，深夜走出影院时，脑海里依然回荡着影片插曲《橘颂》的旋律。那一夜我失眠了，眼前总是出现那位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诗人。

端午节还有一个名字，叫作“诗人节”。随着阅读量的增大和理解能力的提高，我逐渐懂得，在中国古代，能被称为“伟大”的诗人很多，但我一直以为，其中最伟大的诗人，应该是屈原。我所说的“伟大”，不仅仅在于他创作出《离骚》《九章》《天



近现代著名画家傅抱石所作《屈原图》。

问》等，还在于他用他的文字和身躯留给中国人一种气场、一种气韵，那种气韵塑造了文人的精神和品质并一直延续至今。

屈原深远影响着历代文人墨客甚至是普通百姓的生活。南北朝以后，民间开始有粽子源于百姓祭奠屈原的说法。关于粽子的传说还有很多，我的姥姥大字不识几个，但她很智慧，经常给我讲一些民间故事。记得她给我讲的有关屈原的故事是：“很久以前，楚国有一个大官叫屈原，因为他生性耿直，不说假话，得罪了楚王，就被贬了官，流放到乡下。那些年大旱，百姓饥寒交迫，食不果腹，他便用积攒的钱买了地，种了稻子，有了收成之后蒸米饭分给当地的百姓吃。饥民众多，饭碗不够用，有一次他顺手摘了几片芦苇叶，把米包起来蒸熟送给乡亲们，想不到味道特别好，大家纷纷效仿，就有了后来的粽子。”这当然和传说中的故事完全不同，但都是百姓们对屈原的演绎，姥姥在故事中也提到了屈原之死，我想那是人们一种善良的愿望：期待好人永远都活着。民间不知流传着多少这样的故事，虽然情节不同，但大多与屈原有关。

屈原是中国诗歌史上真正走向民间的一位诗人。在他去世后，人们包粽子、赛龙舟纪念他，从而形成了端午节，这种影

响是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能企及的。我曾经在湖北江汉观看赛龙舟，当时觉得异常震撼，我想起了自己家乡场面宏大的舞龙舞狮，在我眼里，它们都是那么风云壮阔。那时候，看着龙舟疾驰，听着鼓声猎猎，就想起了屈原的诗句——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想起了屈原的精神气度、个性品质、政治抱负、艺术探寻……

2016年5月，我到株洲的炎陵、茶陵、醴陵等地采风。一日深夜，我独自坐在湘江边，江是平静的、从容的。望着浩浩江水，恍惚中，我似乎看到了屈原的身影。从湖南采风回来不久后的一个傍晚，霞光横溢，不远处的太行山若隐若现，如诗如梦。那个瞬间，我似乎有了诗兴，于是写下了一首《端午记》。写作这首诗的时候，我觉得屈原离我很近，沅江的江水，有隔世的微凉。

去年端午，我是在滹沱河边一个静谧的村庄度过的。那天晚上，万籁俱寂，群星璀璨，我感觉，天上闪烁的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位逝去的故人。我细数着或者绚丽耀眼或者若隐若现的星星，不知道哪一颗是我心中那位伟大的诗人。这时候，风声松声，暮鼓暮音，融入了滹沱河水轻叹般的音韵，一瞬间穿越了岁月千年。

六一画板

□ 周广玲

调色盘打翻了，
泼洒出整个节日的欢畅。
那些上扬的弧线，
在纸面蹦跳着，
欢快的时光。

我画酒窝时，
有棉花糖的甜味飘来。
两个小漩涡里，
转着捉迷藏的云，
和永远够不着的太阳。

顽皮的嘴角，
突然变成滑梯，
溜下来一串“为什么”和“怎么办”。
我接住它们，
像接住透明的彩虹糖。

而眼睛，当睫毛的栅栏打开，
我看见整个星系，
在虹膜里流转。
他们用目光，
为我戴上露珠编成的教师勋章。

现在孩子们正把画布，
铺到地平线那么长。
每根线条都在生长，
长出会唱歌的树叶，
和数学题一样的蝴蝶翅膀。

一半春深 一半夏长

□ 周淮石

五月的风，已不似四月那般温柔了。它从南边来，带着些微的燥热，掠过树梢时，便惊起几片嫩叶，飘飘荡荡地落在地上。我走在巷子里，看见墙角的蔷薇开得正好，粉白相间，倒像是春天临走时留下的一个微笑。

早晨的露水还未干透，在花瓣上凝成珠子，阳光一照，便显出七色的光彩来。这光彩也是短暂的，不过一个时辰，便消尽了。花开花落是常事，春去夏来，也不过是时序更替罢了。

巷口的老槐树已经长得极茂盛了，浓荫匝地。几个老人坐在树下乘凉，手里摇着蒲扇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。他们脸上的皱纹里夹着汗珠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偶有收废品的老人骑着三轮车路过，却不像小时候的那种吆喝声拖得老长，好像那声音仍在热空气中浮动着，带有几分慵懒的意思。

我走到小河边，看见水比春天时涨了许多，也浑浊了些。几尾小鱼在水草间穿梭，时而跃出水面，溅起几点水花。岸边的芦苇已经长得很高了，青翠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。记得上个月来时，它们还只是刚冒出嫩芽，如今却已能藏得住水鸟了。一只白鹭站在浅水处，单腿独立，一动不动，仿佛也在思索这季节的变换。

午后，天越发闷热起来。云彩懒洋洋地浮在空中，白得耀眼。蝉还没有开始鸣叫，大约是觉得时候未到。倒是几只麻雀在屋檐下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。我坐在窗前，看着阳光透过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那影子也在慢慢移动，如同时间，无声无息地流逝着。

傍晚时分，西边的天空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橘红色。晚风起来了，带着白日里积攒的热气，吹在脸上，竟有些发烫。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都是出来纳凉的。小贩们停在路边，卖着瓜果吃食。西瓜绿皮红瓤，摆在案板上，被路灯一照，鲜艳得几乎要滴出水来。

夜色渐深，月亮升起来了，不是很圆，但很亮。星星却不多，只有几颗特别亮的挂在天边。远处传来几声蛙鸣，断断续续的，像是在试探这夏夜的深浅。我坐在院子里，看月光把葡萄架的影子投在地上，那影子枝枝蔓蔓，像是一幅水墨画。

这便是一年中最温和的时候了——春已深而未老，夏初长而未炽。草木葱茏，却还未被烈日烤得发蔫；微风拂面，尚不至于裹挟着灼人的热浪。人们穿着单衣，既不得冷，也不觉得太热，走在路上，脚步都是轻快的。

我想起汪曾祺先生写过的：“五月，是春天最后的矜持。”这话说得真好。五月确实是矜持的月份，它不肯痛快地告别春天，也不愿急切地投入夏天的怀抱。它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一半在春里，一半在夏中，任由时光从身边流过。

夜更深了。我收起蒲扇，准备回屋睡觉。忽然听见墙根下传来几声蟋蟀的鸣叫，清脆悦耳。这小小的虫子，倒是比谁都明白季节的更替，它用歌声宣告：夏天真的来了。

上海人心中的老北站

□ 王智琦

前些天，路过宝山路、天目东路口，猛然惊觉过街天桥东面一片空旷，原来最为熟悉的标志性建筑物——泰山电影院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印有宣传画的围栏里面，深蓝色塑料布铺满泥泞地面，两台打桩机拔地而起。

其实，在老上海人心中，老北站指的是1908年建成的沪宁铁路站，曾是上海最重要的陆上交通中心和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，直到1987年12月才停止客运业务，整体迁移到了新客站（现上海火车站）。2004年8月28日，在原老北站站房基础上，修建了上海铁路博物馆，一列重新油漆过的簇新蒸汽火车头立在站台上，成为时光凝固的象征。

北站新城地块位于苏河湾核心区，是静安区北站街道最后的一块旧改地块。地块东至罗浮路，南到武进路，西连宝山路，北达虬江路。

我家曾在罗浮路上。罗浮路呈南北走向，南面从武进路开始，途经东新民路，往北至龚家宅路结束，全长只有250米，是条超小型的道路。但它又是一条有历史的小路，为原闸北区和虹口区的相邻道路。早在1917年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，历经多次曲折，由闸北工巡捐局辟筑成弹石路面，命名为福生路。建有悦乐里、德康里等新式石库门里弄。因为此地集中居住着广东籍居民，1947年，福生路改以广东罗浮山名来命名，罗浮路沿用至今。

罗浮路距泰山电影院只一步之遥，这是我在青少年时代最眷恋的文化殿堂，当年的电影《春苗》《杜鹃山》等都是在泰山电影院或山西电影院观看的。当时泰山电影院还叫金光大戏院，山西电影院则称山西大戏院。鲁迅先生曾连续两次到山西大戏院看电影。当年的山西大戏院、金光大戏院附近居住着众多文人雅士，如书画巨匠吴昌硕等，他们诗画写作之余，也需要精神文化的涵养。老北站距北四川路不远，那儿戏院、影剧院众多，正好形成互相倚靠呼应之势。

记忆中的孩提时代，每逢新春佳节之际，探亲者像倦鸟归巢般争先恐后蜂拥归来，而接纳能力极差的老北站则被挤得摩肩接踵、水泄不通，尤其是往返于黑龙江、新疆、云南等遥远地方的列车，拥挤程度难以想象。

那么多乘客在老北站流转集散，周边大小马路承受着极大的压力。老北站占地面积很小，车轨纵横交错不够，车头往往要跑出一段铁轨才能调头，只得把宝山路拦腰阻断。两扇钢丝网状道口门只要一关闭，宝山路上车全部堵住，上班职工急得双脚跳，蒸汽火车头却喘

着粗气，不慌不忙开过去，又慢慢吞吞倒回来。道口门刚一打开，等不及的路人就会形成对冲混乱状态，车辆声嘶力竭地按着喇叭。后来有关部门在宝山路靠近东宝路、西华路口安装了一座笨重天桥，才缓解了人车混行问题，但骑自行车者则不胜重负。现在这座天桥早已拆除。然而，宝山路、天目东路口过街天桥至今仍在，尽管已很少有人会通过天桥过马路，但这座天桥是老北站当年疏解交通压力的见证。

当时，依托老北站的天时地利，可以轻易到达上海东西南北任何地方。抬脚就到火车站；坐上13路、65路公交车可以到公平路码头、十六铺码头乘江轮去宁波或海轮去青岛；51路公交车可以到吴淞码头去崇明、长兴岛；15路公交车到徐家汇；18路公交车到南京路、淮海路；66路公交车去城隍庙；41路公交车到龙华寺……因

而滋生了著名的老北站商业一条街，以泰山电影院为轴心，向宝山路和天目东路两端发射出去，构成了极为红火的街市烟火气。

现在，13路、63路、66路等10来条公交车每天依旧经过老北站，只是车厢内乘客寥寥无几，公交车静静地驶过，又无言地返回。

搬离罗浮路后，我曾多次路过自家弄堂，只见弄堂口被厚重的砖石砌成一道高墙。而天目东路、浙江路口的安康苑地块，已悄然矗立起超高层住宅小区。如今，北站新城加快了建设步伐，与罗浮路悦乐里紧邻的来安里全部被拆平，悦乐里及德康里弄堂口也搭建起密集的手脚架，广告牌上写着：“共谱历史新篇”。只是将来某一天，当我故地重游，敲击那扇熟悉而陌生的黑漆大门时，开门者是否会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？

